

“为己之学”与“知行合一”

——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看梁漱溟的治学道路

连帅华* · 韩知延**

目 录

- 1、引言
- 2、梁漱溟思想的形成及困境
 - 2.1 梁漱溟思想的形成
 - 2.2 梁漱溟思想的困境
- 3、梁漱溟的治学道路
 - 3.1 “为己之学”的思想追求
 - 3.2 “知行合一”的思想实践
- 4、结语

中文摘要

二十世纪初，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影响下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革除了对中华传统全盘肯定的旧迷信，却在一定程度上又制造出对西方文明盲目崇拜的新迷信。1921年梁漱溟在其新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表明了自己不同于“西化派”的文化观和自我意识，围绕这个点作为切入，结合梁漱溟早期的成长背景，实践脉络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打破空间和时间上的割裂，梳理了他思想的启蒙以及在困境中思想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呈现出梁漱溟“思想”和“实践”之间的动力、曲折和张力。认识到“激

* 중앙대학교 대학원 동북아학과 박사과정생, 제1저자(中央大学研究生院东北亚学科博士研究生, 第一作者)

** 중앙대학교 아시아문화학부 부교수, 교신저자(中央大学亚洲文化学部副教授, 通讯作者)

进”与“保守”不是二元思维下的简单对立与割裂，更加开放和辩证地思考，避免对思想和思想者“简单化”、“浪漫化”的评价方式所带来的遮蔽。

关键词：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己之学、知行合一、激进、保守

1、引言

回顾20世纪有关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现代性经验的讨论，梁漱溟和陈独秀，胡适都是五四运动时期重要的知识学人，必然成为不可回避的焦点。陈独秀和胡适等人不同程度的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单一直系的线性进化。陈独秀曾表达过在西方地变化日新月异，而中国已经望尘莫及的悲观意识¹⁾。认为近代文明是“欧罗巴”所独有，以他所信奉的进化论观念来看，欧洲的文明是比中国文明先进、优越，中国要学习更为先进的文明是毋庸置疑的。胡适则认为无论东西，历史，文化的差别，并非所谓根本的差异“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²⁾，并且进一步指出西方文明可以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³⁾。所以，他的主张就是走“全盘西化”式的道路。质言之，世界各民族国家和社会，在同一进化路上角逐，中国显然已远远落在后面，中国要生存在这世界上，就必须因应世界的发展。因此这样的进化论观点成为知识分子认识东西方差异的一个“公理”。在这种线性世界秩序里，既给人落后者可能更落后的警惕，又给人尚可追赶的鼓

1) 陈独秀认为：“欧美文明之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5页。

2) 胡适，《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53页。

3) 同上，第33页。

励。因此，他们提倡更深更广地引进西方文化。

作为日益增强的西化思潮反应而出现的“文化保守派”，主张维护传统文化，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他公开表明自己不同于“两派”的观点。他提出的“文化三路向”，划分了东西文化的不同路向——即意欲向前、意欲调和持中、意欲反身向后。而所谓的“意欲(will)”是他对于文化的定义，指出文化不过是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他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空间界限，在这个结构里面来考察中西文化，打开了有关东西文化新的思考路向。随后“文化三期重现”说中，理论明晰地提出了中西的历史不同、文化性质不同、因而路径不同所以趋向也自然不同。在这里他又突破了“单线程”的时间界限，认为目前西洋文化地繁荣，只是适应目前的问题，而关于“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⁴⁾的判断。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突破，却让梁漱溟被“误解”为反对思想革新运动的文化保守主义代表。

胡适称其学术为“笼统的”，陈独秀称其言论为“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⁵⁾。梁漱溟坦诚地表示他所持文化观念与陈独秀、胡适不同，但坚决否认自己为守旧派，更拒绝将自己视为新文化运动的障碍。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导者们在“对于孔教—礼教彻底批判；对于中国的民族文化也持批判性或否定性的检讨态度；着眼于对传统道德、风俗的变革，提倡科学和民主”⁶⁾，这三个方面存在着共鸣，唯独不能承认中国文化彻头彻尾的全无价值，并由此对未来世界文化的走势提出大胆的预言，未来的文化即是东方文化的复兴。由于对未来发展的预测，不同于典型的进化论式的单线时间进程。但是在文化剧烈变动的时代，这样的“误解”其实是对其思想内容的复杂性、深刻性、多元性地简单和片面的理解。

为了更好地切入讨论，先对学界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思想的论述进行简单的回顾，其中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对梁漱溟多元文化观的研

4)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5页。以下引用梁漱溟原著，只注页码，不注出版信息，以省篇幅。

5)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2卷，第542页。

6) 沟口雄三，《另一个“五四”》，《中国文化》，1997年第15期，第308页。

究，从其主张的“文化三路向”“文化三期重现”等理论主张进行分析⁷⁾。二是对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抑或是文化保守主义派别的思想研究⁸⁾。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激进-保守”“反对-赞同”这种二元式框架下的讨论当中，并不完全能够解释梁漱溟思想的进步性，以及对于早期梁漱溟文化观念的讨论，这样的判断将问题本质化和静态化的分析，虽更容易对人物进行把握，却忽视了透过历史脉络和时代张力以自我反省与改良行动的可能性，并且忽视了思想和思想者的一体性，忽略了梁漱溟本人。上述研究启示我们：一方面对梁漱溟的思想的考察应该注意到思想实践和思想形成的密切关系，从曲折的历史脉络中，理解思想的复杂性以及能动性。另一方面试图摆脱二元对立框架式的讨论，避免简单化处理可能带来地问题的新遮蔽。

梁漱溟是一个“事事都自己有一点主见，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的把定着一条线走去”⁹⁾，他不愿盲从，无论是对过去旧迷信地盲从，还是对当下主流观念地盲从。这种寻求独创，坚持己见的精神，造就了他“为己之学”的态度，与其父梁济对他的影响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本文首先试图摆脱有关五四时期“激进-保守”两类分析框架的讨论模式，打破思想和思想者在时空和叙事上的割裂，注意一体性，通过回顾历史，追寻梁先生社会观察与理论相结合独特的“为己之学”思想魅力，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为中心，探求梁漱溟思想的本来面目。

7) 陈引驰，《类型与时代中西文化之别——“多元现代性”视野下的回顾》，《史林》，2005年第2期、曹跃明，《论梁漱溟的多元文化观》，《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1期、马晓斌、陆卫明，《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中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李永中，《另一种五四新文化——梁漱溟对〈新青年〉的回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陈来，《论梁漱溟早期的中西文化观》，《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3期。

8) 徐福来，《“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看梁漱溟对民主与科学的思考》，《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黄玉顺，《梁漱溟先生的全盘西化论——重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5期、张三萍、马慧玲，《梁漱溟是全盘西化论者吗？——与黄玉顺教授商榷》，《理论月刊》，2022年第7期。

9)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42页。

2、梁漱溟思想的形成及困境

2.1 梁漱溟思想的形成

梁漱溟曾自言道：“早期的思想，是受中国问题的刺激，在先父和父执彭翼仲先生的影响下而形成的”¹⁰⁾。梁父早年为立宪改革奔走，倡导民族主义和思想改良，认为文人之言虚学，不够实用。将一切评价，以及是非善恶“皆以有无实用为准”¹¹⁾。维新救国失败后，梁父积极创办新报纸，也使得梁漱溟“很早便养成了读报的习惯”¹²⁾。自然地对时事充满兴趣。当时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积弱不振，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梁漱溟怀着反对压迫，救亡图存的期盼，加之当时梁启超等立宪派人的舆论影响，主张中国必采纳西方立宪制度方能致于富强。对新制度的接纳，无形之中也包含着对其内部思想的承受——即人们的行动都是有意识地，认为应该“趋利避害的，去苦就乐的”¹³⁾。正因如此，他自己也承认早期所坚持的是“西洋功利的人生思想”¹⁴⁾，并且当时的经济学家所讲的经济学皆本于“从欲望出发”要有“开明的利己心”¹⁵⁾，也因此铸成了他后来所述的肯定欲望、肯定人生、欲望就是人生一切的西方文化路向。

在1928年的一次演讲中，梁漱溟曾讲到：“从十四岁以后心里长抱着一种鄙薄学问的心态，看不起有学问的人，认为学问不如事功，甚至妨碍做事”¹⁶⁾。

10)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130页。

11) 同上，第131页。

12) 同上，第21页。

13) 同上，第131页。

14) 同上。

15) 同上。

16) “我从十四岁以后，心里抱有一种意见（此意见自不十分对）。什么意见呢？就是鄙薄学问，很看不起有学问的人，因我当时很热心想做事救国。那时是前清光绪年间，外国人要瓜分中国，我们要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一类的话听得很多，所以一心要救国，而以学问为不急之务。不但视学问为不急，并且认定学问与事功截然两途。讲学问便妨碍了做事，越有学问的人越没用。这意见非常的坚决。实在当时之学问亦确是有此情形，什么

他将父亲的影响和自身的理会结合起来，使他在当时的民族主义浪潮中，不自觉地处在了浪峰之上¹⁷⁾。在他整个中学时代（1906-1911）是改革派和立宪派处于对中国未来的构想激烈交锋的时期，深受梁启超立宪派的影响与意见相左的革命派针锋相对，直到1911年为止，他仍旧坚持中国要沿着西方的道路，积极拥护立宪派的以西方模式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革。

中学时期梁漱溟对政治的参与只是“纸上谈兵”，进入民国以后随着政治参与的深入，不仅打破了对民主的幻想，也改变了他早期功利主义思想，但也因此丧失方向，精神迷乱。为了度过这段精神危机，1912年梁漱溟决定与外界隔绝，全身心地投入佛教研究中，思想开始向古印度“出世”思想转变，这场个人的精神危机一直持续到1916年。勤于思考的梁漱溟通过佛教的唯识学为自己寻找走出精神危机的办法，并且重新对人生苦乐的思考，明白了“人生是苦”，却又要毅然决然的投入到世俗当中。这场精神危机之后，曾经崇信梁启超所主张的民族主义，立宪制度以及对于中国问题想要进行急迫解答梁漱溟已不复存在了。他更加地相信生搬硬套西方的做法，并不能让中国至于富强，而是要为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思想和见解。

2.2 梁漱溟思想的困境

中国在遭受西方列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为受到外部冲击和进化论思想的进入导致当时的知识分子纷纷陷入物竞天择的生存危机与不进则退的竞争焦虑，进而引发了包括“救亡”和“图存”在内的各种复杂观点的交织，并产生了各种不期然的客观效果。清末政府用了近60年的时间，以拿来主义的方式学习

八股词章、汉学、宋学……对于国计民生的确有何用呢？”梁漱溟，《我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3-104页。

17) “他年仅12就去散发传单，号召大众参加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他和同学冲进附近店铺寻违禁美货。”[美]艾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第42页。

并引进器物层面的“西方”。这样的“拿来主义”延续到民国，经过改良、改革和革命进化后成为“制度决定论”，这样的通过他者来反视自己，自身主体性地丢失，却逐渐地成为了与西方互动的一种方式。为了全方位的和世界接轨而产生的启蒙运动，甚至不惜以全方位的和自己古老的历史和文明断裂作为代价。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进化论观念地输入，使得中西之间地冲突开始变得尖锐，也由此激发了对传统文明与社会形态全方位的拒绝和批判。因此关于梁漱溟讨论停留在二分或是派别论是不够的，而应放回当时复杂的历史脉络中进行理解。

这时期，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究元决疑论》（1916），并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在此前后，陈独秀，李大钊相继进入北大，此时的北大新思潮高涨，五四期间，关于东西文化地争论日趋激烈。这些争论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获得现代性，即反传统运动。激烈一些地讨论将对传统文化的清算和批判当作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前提条件。稍微温和一些讨论则是以静的文明、动的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这些二元式地讨论，企图在东西文明之间做出某种划分，并且在这种划分之上建立起自己的文明形象。这种寻找与现代西方不一致性的方式实际上是在模仿西方人的眼光。梁漱溟曾感叹道：“在今日欧化蒙罩的中国，中国式的思想寂无声响”¹⁸⁾。在西方中心论的思潮下，知识分子们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整体性问题与影响的把握，因此容易照猫画虎似的将理论或概念生搬硬套，或是削足适履般的将中国议题从自身历史的脉络中抽离出来。

梁漱溟曾表示：“自己并不反对欧化，并且认为当今欧化即是世界化，东方无法例外”。¹⁹⁾ 这样的辩解是必要的，按照欧化即世界化，东方也不能置外这样的说法，其本身并不可能是反对欧化。梁漱溟初到北大时，就对校长蔡元培和陈独秀表示，他是为释迦，孔子打抱不平而来。在1918年与张申府地谈论中

18)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33页。

19) “有以溟为反对欧化者，欧化实世界化，东方亦不能外。然东方亦有其足为世界化而欧土将弗能外者。”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547页。

曾表示过自己所提倡的东方文化完全不同于“旧头脑”的主张，“我当时叙说我的意见，就是我观察西方化有两样特长，所有西方化的特长都尽于此。我对这两样东西完全承认，所以我的提倡东方文化与旧头脑的拒绝西方化不同”²⁰⁾。同时也明审了他并不拒绝西方文化，更不反对西方文化。而他所提到的两样特长，即“科学的办法”和“个性的伸展、社会性的发达”²¹⁾，则是学术上的科学与社会上的民主，而到民国九年即1919年，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明确地提出了“民主”和“科学”²²⁾，于此民主与科学开始普遍走进人们的视野。梁漱溟不仅早早地看出了东西文化最重要的差异点，并且与陈独秀在思想上不谋而合产生了某种共鸣。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激化并爆发，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与反思。在这种全球性地变化中，中国思想与学术界，再次以被动的姿态，发生着与新文化运动初期的绝对欧化主义相似地转变²³⁾。此时，东西融合成了当时“文化精英”的主张。在西方中心主义和现代化意识下，“文化精英”们这样随意地转换，其实是自认了东方文化的“落后”，并且不断地融合中被“问题化”。而在此后的发展中，梁漱溟则是以行动的方式投入到乡村建设中，直接地介入到中国现代化建构实践的过程中。之所以采取这种与主流西方取向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不同行为方式，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在这场危机中同时存在“自毁”和“它毁”这两种力量²⁴⁾，以及新教育制度下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与民众双向疏离。

20)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49页。

21) 同上，第349页。

22)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1卷，第362页。

23)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蔡子民先生还有几位教授要到欧美去，教职员开欢送会……他们所说的话大半都带一点希望这几位先生将中国的文化带到欧美而将西洋文化带回来的意思。”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330页。

24) “所谓自觉地破坏，那就是为外力破坏所引起之几十年来 的民族自救运动，自救适成为自乱。在这自乱当中，外力更易施其技而加强其破坏。（而这）厌弃与反抗，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引起这厌弃反抗的自身缺欠，是中国文化的真失败点”；“自救适成为自乱。在这自乱当中，外力更易施其技而加强其破坏。（而这）厌弃与反抗，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14，200页。

3、梁漱溟的治学道路

3.1 “为己之学”的思想追求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一开始便清楚地对当时的世界趋势进行了表述：“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凡能领受接纳西方化而又能运用的，方能使它的民族、国家站得住；凡来不及领受接纳西方化的即被西方化的强力所占领。……几乎使我们现在的生活，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充满了西方化，这是无法否认的”²⁵⁾。他清楚地认识到整个世界西方化地趋势已势不可挡，颇有一种顺者昌，逆者亡的态势。在西化浪潮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随之改变，人们可以很自然的进行概念思维、语言分析²⁶⁾，并且把时间划分为过去、现在、未来，将时间赋予思维上的空间意义，从而客观化、对象化。而人们对未来的看法，基于过去和现在，以已经生成的眼光看尚未生成的事情，以固定的思维判断不定的未来，并美其名曰：“历史车轮滚滚向前”²⁷⁾。为了生存，中国人被逼讨着，对现代化问题求一个解决。

在梁漱溟看来，现代化过程从根本上来说受制于文化，一个民族的强弱或盛衰，由这一民族的文化决定，而文化又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它不可被拆分。人类生活方法的不同导致了文化的差异，意欲的方向决定了的人生态度。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就是人类满足“意欲”而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法。梁漱溟的思维方式正是中国传统的“象思维”²⁸⁾。在他看来生活就是相续，一问一

25)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32页。

26) 李曙华认为：“近代以来，西方概念思维下两大知性构架——民主与科学，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关键，然而长期以来却“矫枉过正”，将中国文化与民主科学对立，致使我们的思想始终在“西化”与“国粹”两极震荡。”李曙华，《两种思维方式下的中西文化与科学》，《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12页。

27) “尽管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优秀学者未曾放弃过中西会通之努力，但尚未深入涉及思维方式问题。”同上，第12页。

28) 相关研究者指出：“中国的‘象思维’是一种动态整体的悟性思维，与西方概念的理性思维

答、因果相接。生活不是主客二分以后的产物，生活与生活者不可二分。针对中国问题，梁漱溟的主张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²⁹⁾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相对于欧化派从根本上打倒的态度，梁漱溟的方案其实是可以避免文化断层的处境，思考的是如何“老根上发新芽”从传统的中国继往开来成为现代的中国。

梁漱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功能上考虑这时期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实际影响，从总体上考虑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能否产生互动的可能性。他提出的“人生三路向”，将世界文化可分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三个文化系统，分别代表了意欲的三种方向：西方文化意欲向前，注重“奋斗”，强调人征服自然、追求物质；中国文化意欲自为，注重“调和”，强调生活的和谐，追求“内在满足”；印度文化则意欲反身向后，崇尚“弃世”。并且进一步归纳，将三种人生态度（意欲向前、意欲调和持中、意欲反身向后），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排列方式，引发他的“文化三期重现”说³⁰⁾。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梁漱溟的“文化三期重现”说的基本讨论方式是一种单线进程的历史观，一方面，他实际承认了当下的世界里存在三种文化；另一方面，关于未来的世界，貌似多元的三种文化路向是依次出现，即每次出现时仍是一元。这种推论方式与黑格尔的古代、亚细亚、近代三段论的思维方式是相似的，即将空间的文明关系时间化。中国社会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早熟”³¹⁾，即还没有走完西方文化奋力向前的路，就提前转到了

不同，它是一种‘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富于原发创生性’的思维方式。”同上，第10-17页。

29)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28页。

30) “第一路走完，第二问题移进，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之会，于是照样也拣择批评的重新把中国人态度拿出来……中国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同上，第527页。

31) “我们东方文化其本身都没有什么是非好坏可说，或什么不及西方之处；所有的不好不对，所有的不及人家之点，就在步骤凌乱，成熟太早，不合时宜……我们不待有我就去讲无我。不待个性伸展就去讲屈己让人，所以至今也未曾得从种种威权底下解放出来”同上。

调和持中的路上并开始了盘旋。这样其实是为单线进程的历史增加了“变数”，也承认了历史的进程不必是单线程不断向终点迈进的过程。意欲不仅会决定生活的样法，同时生活的样法也能够改变意欲。这样地见解多多少少构成了对进化论的挑战。

但是，对于一个不论改革还是革命经历了近半世纪失败史的国家，身处西方所创造的“丛林法则”的世界里，中国必须以学习西方的工业化为生存保障和基本条件。这样地学习过程是一个十分痛苦的历程，因为需要变革的绝不仅仅是拿来就用的物质层面东西，还包括通过它者来定位自己，主动“问题化”互动方式，以及牵扯着每一个置身事内人的无法忽视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危机。

3.2 “知行合一”的思想实践

梁漱溟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见解，除了他对东方文化内在价值本来就有的肯定外，也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弊病之省觉，而这样的自觉其实是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无法忽视四重屏障“首先是虔诚仿效西方与发现西学‘破产’的困惑；第二是全盘实现西化与西学多元取向的困惑；第三是理智接受西方与情感面向本土的困惑；最后是拯救民族危机与文化出现‘真空’的困惑”³²⁾。梁漱溟当然也不能例外，他的一生经历了“近代西洋功利主义思想，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³³⁾三个不同的时期，而这样的看似矛盾的思想转变，正是因为他留心时事，关切社会。他在回顾自己推进乡村建设运动时讲到：“我的许多实际而具体的主张，无一不本诸我的理论，而我的理论又根由于我对于社会之观察以及对于历史之推论分析等等”³⁴⁾。

第525页。

32) 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9页。

33)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590页。

34) 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第72-73页。

这种思想背后，是梁漱溟“思”践于“行”的真诚人格，更是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真探索。

梁漱溟根据世界文化或者说西方文化地变化趋势提出自己的想法，这样的判断与当时的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别无二致³⁵⁾，西方现代化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成就，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繁荣背后所隐藏的问题，终于暴露无遗。器物地发展没有给人类带来全面的、真正地幸福，精神地忽视反而暴露出种种问题，如精神危机、人际关系的疏离、功利主义的恶性膨胀等。只发展了生存手段，却丧失了更重要的与人与环境相处生存的智慧。

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状况表明，梁漱溟认为人类现在是由物质不满足的时代走向精神不安宁的时代³⁶⁾。西方在第一路向上即人和物的关系走到了极端，产生了异化。人类异化为劳动工具，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压迫，忽视了人与人的关系，使社会分化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阶级。人类社会将必然“从人对物质的问题之时代而转入人对人的问题之时代”³⁷⁾，而在第二路向上的中国正是以调和人与人的关系所见长，由此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³⁸⁾。在这里，梁漱溟已经解答了东西文化问题。通过对孔子“刚”的思想的领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现在的中国人需要一种“奋往向前的风气，而同时排斥那种向外逐流的颓流”³⁹⁾的人生态度。

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梁漱溟将儒家文化视为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梁漱溟从人类整体出发，在他的眼中“中国文

35) 梁漱溟认为：“当西洋人力持这态度以来，总是改造外面的环境以求满足，求诸外而不求诸内，求诸人而不求诸己，对着自然界就改造自然界，对着社会就改造社会，于是征服了自然战胜了权威，器物也日新，制度也日新，改造又改造，日新又日新，改造到这社会大改造一步，理想的世界出现，这条路便走到了尽头处。”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93页。

36) “以物的态度对人，人类渐渐不能承受这态度，随着经济改正而改造的社会不能不从物的一致而进为心的和同，总要人与人间有真妥协才行。又以前人类似可说在物质不满足的时代，以后似可说转入精神不安宁时代。”同上，第495页。

37) 同上，第494页。

38) 同上，第525页。

39) 同上，第538页。

化”是代表一种注重协调、平等、人性的文化路向与文化精神，它是可普遍化的。这样的思考突破了“民族-国家”这样的空间界限；“未来的东方化”也并不是时间上地倒退，而是突破了单线程的时间界限，作为解决人类问题一种预见。当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界限，未来中国文化地复兴和当下对西化的全盘承受并不相矛盾。

4、结论

中国在遭受西方列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受外部冲击和直接侵略而导致生存危机与竞争焦虑，进而引发了包括“自强”和“自救”在内地复杂实践与各种不期然的客观效果。在强势国家主导的全球秩序下，部分知识分子从各层面所进行“激进”和“现代化”的努力。这样地努力不仅是对战争、侵略、屈辱各种形式的抵制与警醒，更包括由此开启的努力 改变和偏离国情与资源条件制约下的社会形态和文明基础，并由此激发起对千年农业文明所形成的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认同地拒绝与批判。而正是这种偏离和拒绝使“五四运动”难以带来真正的启蒙。对于这段历史不能认同于割裂、对立的主流叙述和近人视角地简单批判，但仍要清楚意识到，“这一试图在文化层面上有所作为的‘中式启蒙’却使得“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及古老历史在新世纪骤然断裂”⁴⁰。

梁漱溟的思想随着外部环境与历史脉络地变化而变化，却不对自己的历史妄自菲薄，所秉承的思想不仅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互相平等的多元包容思维，更基于晚清以来充分的历史教训——各种生搬硬套的做法，并不能让中国至于富强，而是要为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如果保守意指“维持现状、不要变”则“严格地说，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

40) 许纪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3页。

程度变革的人而已。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往往就变成了保守主义者⁴¹⁾。“激进”与“保守”也不是二元思维下的简单对立与割裂，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地联系与互动。他的思想也不是“中西调和”与“全盘西化”逻辑下消极地“防御”，而是积极开拓的风气以及对各种主流思想的质疑，以及不沮丧，不厌生的孔子“刚”⁴²⁾的思想态度。

更进一步说，梁漱溟的思想和实践也有着面对历史和外部环境诸多限制下的“不得不”尴尬——如果说民国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的现况，是对传统的拒绝和批判才能基本与西方互动而导致的文化断层的危险环境，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冷战”和“后冷战”时期，其所借助的思想资源与民国时期的拿来主义也别无二致——常常夹带着“西方中心主义”⁴³⁾的烙印。正因如此，“保守”和“激进”并非只有对立⁴⁴⁾，更是充满了探索性与多面性。

梁漱溟试图超越“空间”和“时间”的界限，将二元对立转向二元互动。但如今，如何在“革命史”与“现代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叙事框架的夹缝中，避免被“成王败寇”、“就事论事”等常见的评价方式所遮蔽的对思想和思想者“简单化”、“浪漫化”的评价方式，我们的认知也需要更加的开放与辩证。

41) 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第422页。

42) 如梁漱溟所诉：“我今所要求的，不过是要大家往前动作，而此动作最后要发于直接的情感，而非出自欲望的计虑”也不是“随着社会运动而来的风气，和跟着罗素创造冲动占有冲动而来的滥调”。这样的动“并没有两面看清而知所拣择，所以杂乱分歧，含糊不清，见不出一方向，更不及在根本上知所从事”。只有这样才能“解救了中国人的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应付了世界的需要”。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45页。

43) 余英时认为：“中国现代思想的激进化在‘文革’时期已走到了全程的终点。……经过七十年的激进化，中国思想史走完了第一个循环圈，现在又回到了“五四”的起点。西方文化主流中的民主、自由、人权个性解放等观念再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价值。全面谴责中国文化传统和全面拥抱西方现代文化似乎是当前的思想主调，……从《河殇》的轰动一时，我们不能窥见反传统的激进思想是多么深入知识分子之心”转引自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第429-430页。

44) “现代”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同时继续并重建了传统，两者之间又是互相依存的。”余英时这种论述是将传统和现代的一种和解。同上，第436页。

参考文献

-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 陈引驰,《类型与时代中西文化之别——“多元现代性”视野下的回顾》,《史林》第2期,2005年。
- 曹跃明,《论梁漱溟的多元文化观》,《中国哲学史》第1期,1997年。
- 胡适,《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第7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 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 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 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 [美]艾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
- 陈来,《论梁漱溟早期的中西文化观》,《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3期,2001年。
- 李永中,《另一种五四新文化——梁漱溟对〈新青年〉的回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2019年。
- 李曙华,《两种思维方式下的中西文化与科学》,《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2008年。
- 黄玉顺,《梁漱溟先生的全盘西化论——重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2018年。

- 马晓斌、陆卫明, 《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中心》,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2013年。
- 徐福来, 《“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看梁漱溟对民主与科学的思考》,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 2007年。
- 张三萍、马慧玲, 《梁漱溟是全盘西化论者吗?——与黄玉顺教授商榷》, 《理论月刊》第7期, 2022年。

Abstract

“Learning for Oneself” and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 An Analysis of Liang Shuming’s Way of Doing Scholarly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Philosophies*

Lian Shuaihua · Han, Ji Ye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emerg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modern enlightenment ideas. Although the old superstition that fully affirmed Chinese tradition has been abolished, it has to some extent created a new superstition of blind worship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Liang Shuming publicly expressed his cultural views and self-awareness in his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Philosophies*. Taking this point as a starting point, combined with Liang’s early growth background, practical context, and social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he broke through the separation of space and time, sorted out his enlightenment of though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ought in difficult situations. Based on this point, the dynamics, twists and turns, and tension between Liang’s thoughts and actions are presented. Realizing that progressive and conservative views are not simple opposites and separations under binary thinking, we should think more openly and dialectically, avoiding the shielding brought by the evaluation methods of simplification and romanticization of ideas and thinkers.

Key words : Liang Shuming,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Philosophies, Learning for Oneself,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progressives, conservatives

투 고 일 : 2024. 1. 10. / 심 사 일 : 2024. 1. 15. ~ 2024. 2.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4. 2. 20.

